

比较政治学前沿

Frontier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No.2



第 2 辑

概念分析指南

比较政治学中的概念误构

概念延展新论：比较研究范畴之调整

本质上争议的概念

论社会政治概念的可争议性

怎么才算个好概念？

乔万尼·萨托利

乔万尼·萨托利

戴维·科利尔 小詹姆斯·玛宏

沃尔特·布赖斯·加利

约翰·N. 格雷

约翰·吉尔林

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

| 主编 高奇琦 景跃进 | 主办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比较政治学前沿》系列辑刊，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组织编辑，每年出版两辑。

本辑刊是以比较政治学为核心的系列学术辑刊，旨在把握学科前沿，巩固学科基础，推动学科发展。辑刊在初期将通过翻译引介国际比较政治学界的经典和前沿成果，为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提供基本的文献资料；同时 will 积极创造条件，汇集和推介中国比较政治学的优秀成果，加强国内外比较政治学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中国比较政治学的深入发展。

出 版 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杜永明
封面设计：田晗工作室

比较政治学前沿②

Frontier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No.2

■ 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

ISBN 978-7-5117-2199-0



9 787511 721990 >

定价：69.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政治学前沿(第2辑):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 / 高奇琦、景跃进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17-2199-0

I. ①比…

II. ①高…②景…

III. ①比较政治学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0521号

比较政治学前沿(第2辑):比较政治中的概念问题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杜永明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总编室) (010) 52612341(编辑室)

(010) 66161011(团购部) (010) 52612332(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发行部) (010)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e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6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比较政治学前沿》序言

在我国的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日益发展成为一门基础性的二级学科，并且有力地推动着政治学基础理论的日益完善与前沿领域的不断拓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比较政治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最能代表政治学发展的方向，而且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正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① 在这种情况下，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组织编辑的《比较政治学前沿》系列辑刊应运而生。本辑刊创办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知识引进来促进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

毋庸讳言，比较政治研究近年来在中国才真正得以起步，而国际学术界对于比较政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并且引领着这一学科的前沿发展。因此，对于国外先进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便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学术任务。《比较政治学前沿》的初期定位，便是将国外有关比较政治理论与方法的经典文献译到中文世界中来，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文献资料和学科基础。而华东政法大学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也能够以本辑刊为平台，汇聚国内外比较政治研究的精华，创造出更多的学术贡献。

^① 杨光斌 “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29日。

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简称“华政”）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之一。1952年，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等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组建成立了华东政法学院。长期以来，法学一直是华政的传统优势学科。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华东政法学院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自更名以来，华政致力于发展成为一所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为重点，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特色大学。因此，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在法学之外的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突破，而政治学则是华政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也是最有希望率先实现突破的新兴学科。

政治学在华东政法大学是一门具有历史渊源的年轻学科。如前所述，华政在创立伊始便合并了圣约翰大学等院校的政治系，而这些院校的政治系是当时华东地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力量。圣约翰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和“外交人才的养成所”^①，在这座优美的校园中，曾经建立起国内较早和较完整的政治学学科，并培养出邹韬奋、顾维钧、施肇基、荣毅仁、李慎之、陈鲁直等一批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虽然经历了坎坷的历史过程，但是华政政治学发展的火种却一直传承，并未熄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华政逐渐恢复了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目前华政的政治学学科发展迅速，且已颇具规模。

华东政法大学高度重视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作为“大法学”下的姊妹学科，法学和政治学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也都是“政法”院校的重要基础学科。单从具体的子学科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政治学理论与宪法学、行政学与行政法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法学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互融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政的法学与政治学学科间可以实现相互给养，也就是说，传统的法学优势可以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支撑，而政治学学科的完善也

^① 张仲礼“序”，见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会为法学学科的进一步拓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科支持。因此，就长远发展而言，我们还需要继续加强和推进政治学学科的建设。

在上述观念的指导和支持下，华政的政治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05年，华政获批上海市首批政治学教育高地；2007年，政治学开始作为校级重点学科进行建设；2008年，成立政治学研究院。此后，政治学研究院，一直以比较政治学为中心推进学科发展，并汇集了一批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人才。研究院还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如在2010年举办了国内第一场以“比较政治学”为关键词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国内第一份以“比较政治学”为主题的辑刊等。可以说，政治学研究院为华政政治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2年，由于相关人事变动，政治学研究院更名为政治学研究所，虽然机构有所变化，但基本的研究队伍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特色得以延续，并有望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而《比较政治学前沿》正是这种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

现在的政治学研究所由一支年轻的研究团队组成，从这个团队身上，我看到了学术的激情和华政政治学的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政治学研究所已经围绕比较政治研究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建设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政治学的数据库网站，在国内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我希望《比较政治学前沿》能够延续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通过严谨的学术翻译和经典引介，顺应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前沿的理论与方法，也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谨此为序，与学界同仁共勉。

何勤华

2012年8月28日

于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

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

——《比较政治学前沿》第2辑编译说明

概念研究是比较政治分析的基础和起点，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中。迄今为止，国外在比较政治的方法研究方面出现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献包括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阿伦·利帕特（Arend Lijphart）的“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以及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图纳（Henry Teune）在1970年出版的《比较社会研究的逻辑》等。第二次浪潮出现在八十年代末期至今。代表性成果包括查尔斯·拉金（Charles C. Ragin）的《比较方法：超越质性和定量策略》，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著的《社会研究设计：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亨利·布拉迪（Henry E. Brady）和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主编的《重新思考社会研究：多元工具与共享标准》，拉金的《重新设计社会研究：模糊集合及其他》等。

在比较政治方法研究的两次浪潮中，概念研究都是核心问题。在第

* 本导言的部分内容已发表于《欧洲研究》2013年第5期。

一次浪潮中，萨托利关于概念的讨论几乎是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出现的。在第二次浪潮中，概念分析仍然是比较方法中非常重要的一支。许多比较方法的新一代重要人物中许多都在概念分析方面有重要著述，这些人物包括科利尔和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等。而科利尔和吉尔林主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与方法：萨托利的传统》一书被看作是第二次浪潮中的经典作品之一。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概念研究对于比较政治学如此重要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比较的实质是概念的跨案例适用，或者用萨托利的表述是“概念移植”（concept traveling）。当人们进行比较时，往往是从某一起点原生类型出发的。人们总是在特定语境下特殊经验的基础上对某种经验现象类型进行概念化，然后将其运用于新的案例来验证原来的起点类型（或者是其总结后的概念），这样便由此形成了跨案例的比较。由于许多概念在形成产生时并不是为普遍性适用而设计的（很多概念是它们乃基于特定的经验而生成的），所以当人们运用这些概念生成后来进行跨案例的比较适用时，就出现了萨托利所言的“概念延展”（concept stretching）的问题。^①

第二，几乎所有的比较方法都把概念分析作为其研究的起点。最常见的比较方法是相似案例比较，即在相似的国家中发现它们的重要差异点，并用这些差异来解释所观察到的政治结果。^②这一方法要求我们需要保证所比较的对象在绝大多数特征上都是一致的。那如何可以确定这些对象在多数特征上保持一致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特征进行概念界定，并将其操作化，

① 对概念延展的理解，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概念好比一件衣服。一个理论家在提出某一概念时，往往针对某一国家的经验而言。就好像一个裁缝在设计一件衣服时，总是按照某个人身材来的。所以，当一件为某甲设计的衣服穿到某乙的身上时（假设某乙的身材比某甲大），那么穿到某乙身上的这件衣服一定会出现一种拉扯或拉伸的现象。

② 相似案例比较在密尔那里被称为“求异法”。在利帕特那里，这种方法则被称为“可比较案例策略”（comparable-cases strategy）。Arend Lijphart, “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8, No. 2, 1975, pp. 158 - 177.

然后再进行相关特征的比较。同理，在另一种常见的比较方法——相异案例比较中，^① 同样需要首先界定这些案例如何在多数特征上不一致。

在二十世纪末期，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和质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这些进展同样高度依赖概念分析。譬如，比较历史分析目前有两个最重要的分支发展。一个是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分析，即力图通过对自变量 X 的变化如何导致因变量 Y 变化的过程和方式的研究，打开统计分析在变量 X 和 Y 之间的解释黑箱。^②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过程分析的关键是在 X 与 Y 之间找到新的、中间性的、解释性概念。另一个是时序分析法（temporal analysis）。这一方法的使用者注意观察各个事件在历史中的位置、持续时间及先后顺序，并力图发现这些因素对特定结果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实际上在传统的历史分析中一直就存在，而时序分析的发展就在于它引入和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历史分析概念，如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偶发事件（contingent event）、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自我强化（self-reinforcement）、顺序（sequencing）、持续时长（duration）及时机（timing）等。^③ 同时，在时序分析中，对历史进程中的事件性质的定义以及对历史分割点或门槛的确定都需要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来实现。

再如，质性分析方法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布尔代数法（Boolean algebra）和模糊集合法（Fuzzy sets）上。这两种方法都是比较研究中的编

① 这一方法在密尔那里被称为“求同法”。普沃斯基和图纳则将这一方法改良为“最具相异性系统”设计。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70, pp. 34–39.

②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p. 206.

③ 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2000, pp. 507–548;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2000, pp. 251–267.

码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却分别基于不同的概念界定模式。布尔代数法所基于的是清晰集合（crisp sets）理论。其中，作为原因（cause）与结果（effects）的诸“变量”只能取0和1这两个值，^①其运用的最佳对象是那些可以明显进行两分的概念，如市场与计划、男性与女性、穷国和富国等。与之相反的是，模糊集合理论和基于其的比较方法则针对那些相对模糊的、程度性的概念进行更为细化的赋值。在模糊集合中，“变量”可以在1和0之间的连续区间内取任意值来表明不同程度的隶属度（如0.2、0.75等）。每一个对象与相关概念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隶属度，而这种隶属度可以进行定量的赋值。简言之，布尔代数或清晰集合分析基于的概念界定模式是本质主义的两分法，而模糊集合则基于程度主义的分级法。模糊集合的发展与分级法在概念分析中的进展密切相关。

总之，概念分析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起点。当人们对某项比较的结果争执不休时，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回到起点，从概念界定开始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正如萨托利和利帕特多次强调的，比较方法是在“变量太多、案例太少”的情况下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控制方法。^②这种控制的逻辑不是统计性控制，因为多国比较时的案例数量非常有限，同时在比较时，这类系统内部的变量非常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且这些变量还包括许多非常庞杂的次级变量。比较性控制主要通过变量特征的相似或相异来实现。例如，如果某一特征在多个案例中的表现都一样，那我们可以比较分析中将这一特征视为常量。或者说，这一特征便被控制住了。这种控制特征使得比较方法更接近质性研究，而同时，质性研究与概念分析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

① 严格来说，在布尔代数法和模糊集合法这样的（小样本）质性比较方法中，只有“原因”和“结果”，而无“自变量”与“因变量”一说，后者应用于基于大样本的统计分析中。

②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 1971, p. 684; Giovanni Sartori, “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3, No. 3, 1991, pp. 244 - 245.

一、概念研究的萨托利传统

1970年的《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是萨托利关于概念分析的第一篇经典文献。在这篇文章中，萨托利与当时非常流行的定量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展开辩论。萨托利把沉溺于调查技术与社会统计的研究者称为“过度自觉的思考者”(over-conscious thinker) [核查一下，我的印象是，萨托利称他们为“纯粹、简单的不清醒的思想者(unconscious thinker)”——欧阳译语]。^① 萨托利反对那种把所有的定性问题都转化为程度问题的定量分析，并且特别强调了分类研究在比较分析中的重要性。^② 同时，萨托利也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对概念过度功能化的定义。萨托利认为，结构功能主义虽然声称其会从结构和功能两方面来对概念进行界定，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是在功能化的意义上进行表达。在萨托利看来，结构功能取向的分析家成了跛脚的学者。^③ 在萨托利看来，定量分析的绝对论和结构功能主义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即低估了概念形成后的“移植”(travelling)问题。以参与和动员这两个概念为例。参与和动员本来是体现了独特的西方经验的、限于特殊文化的概念。参与并不是任何形式的“参加”，而是指一种自动愿的参加，而动员则表达一种在强大政府说服力的基础上消极地、被动地卷入的状态。因此，在西方意义中，参与恰好是动员的反面。然而，在比较政治

① 萨托利批评道“我最为不满的是，(除了极少例外)政治科学家显然缺乏逻辑训练，……，这些人除非手头有温度计，否则就拒绝探讨冷热问题。”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1970, p. 1033.

② 萨托利指出“只有当它们都具有这一特征，这两个项目才能在孰多孰少方面进行比较。因此，分等的逻辑(the logic of gradation)隶属于分类的逻辑(the logic of classification)。”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1970, p. 1038.

③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1970, p. 1047.

的背景下，参与和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重叠性的概念。在萨托利看来，这是一件极具讽刺性的概念运用。

萨托利在此文中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抽象阶梯（ladder of abstraction）这一分析工具。萨托利界定了抽象的三种范畴。第一，普适性的概念化（universal conceptualization）是概念抽象的高级范畴，其可以在异质的背景下进行跨地区的、全球性的比较。这一概念形成的特征是外延最大化且内涵最小化。对概念外延的界定往往通过否定性定义来实现。第二，一般性的概念化（general conceptualization）是概念抽象的中级范畴，其可以在相对同质的背景下进行地区内国家的比较。这一概念形成的特征是在外延与内涵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对概念的界定主要通过属加种差（per genus et differentiam）来实现。第三，形构的概念化（configurative conceptualization）是概念抽象的低级范畴，其主要用于国别分析。这一概念形成的特点是内涵最大化且外延最小化。^①在抽象阶梯的基础上，萨托利给出他所钟意的概念分析方法——“一、沿着具有更好中间范畴的中等抽象水平来发展这一学科；二、沿着抽象阶梯，既向上又向下，且按以下方式进行演练：把相同与差异、相对较高的解释力和相对准确的描述性内容、宏观理论和经验验证等内容统一起来。”^②当然，萨托利的办法也并不完全是完美的。譬如，萨托利指出，通过减少属性来实现概念的进一步普遍化。但这会产生一个属性选择的问题，即到底应该减少哪些属性呢？这些减少是否会受到研究者个人喜好或价值判断的影响呢？譬如，西方学者在将民主的内涵向上抽象时，基本上将其内涵削减为选举，这明显是有问题的。当然，萨托利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只要沿着梯子攀爬，就总会有得有失。”^③

在1984年主编的《社会科学的概念：一个系统分析》一书中，萨托利撰写了前面最为重要的一章“概念分析指南”。在这一部分中，萨

①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1970, p. 1044.

② Ibid., p. 1053.

③ Ibid.

托利从整个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对概念所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讨论。萨托利先是讨论了术语 (term)、意义 (meanings) 和指称 (referent) 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了概念的缺陷是由术语和意义之间的歧义 (ambiguity) 和意义与指称之间的模糊 (vagueness) 造成的。萨托利重点区分了陈述性定义 (declarative definition) 和指涉性定义 (denotative definition)。陈述性定义旨在减少或消除歧义，而指涉性定义可以帮助人们较为容易地找到相对应的指称。萨托利还区分了界定概念的两类属性：决定性属性 (defining properties) 和伴随性属性 (accompanying properties)。萨托利强调说，一定要确保概念定义是充分和简洁的：充分指的是定义包含足够的属性去确认其指称的对象和边界，简洁则是指决定性属性中间不包含任何伴随性属性。^①

萨托利非常感慨社会科学中在概念使用上的混乱。^② 他总结了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概念使用所存在的几种谬误：(1) 认为必须在上下文中才能消除歧义；(2) 认为概念精确是个虚假的理念；(3) 认为文学语言可以展示一种诗化的力量；(4) 认为概念可以被随意地使用；(5) 认为稳定的词汇对于尚在起步阶段的科学是有害的；(6) 认为尝试给语言确立标准的努力是错误的。^③ 萨托利强调说，概念的界定一定要清晰，即在术语和意义之间要避免歧义，要消除一词多义和多词一义，同时也要简洁，即在意义和指称之间使用决定性属性来界定。总之，萨托利在该文中表露出一种“早期维特根斯坦式”的雄心，^④ 即希望通过给概念确

① Giovanni Sartori, "Guidelines for Concept Analysis," in Giovanni Sartori, ed.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Sage, 1984, pp. 22 - 34.

② 萨托利指出，“我们急需概念重构用以挽救当今大多数社会科学呈现的混乱状态。……。如果没有概念重构在先，……，他所做的无非是在既有的 50 种意义的基础上再给出第 51 种意义罢了。” Giovanni Sartori, "Guidelines for Concept Analysis," in Giovanni Sartori, ed.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Sage, 1984, p. 50.

③ Giovanni Sartori, "Guidelines for Concept Analysis," in Giovanni Sartori, ed.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Sage, 1984, pp. 57 - 63.

④ 在其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ndwig Wittgenstein) 力图以接近于几何严格性的定义方式界定各个基本概念。在序言中，维特根斯坦自信地说道“在这里所阐述的真理，在我看来是不可反驳的，并且是确定的。因此我认为问题基本上已经最后解决了。” [奥]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21 页。

立标准，然后为社会科学厘定出一组经过清晰界定的概念，并以此来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萨托利的努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主张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在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几乎还没有人可以确立一整套标准化的、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一个可以用来佐证的事实是，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转向语言游戏说，某种程度上也宣告了其早期努力的失败。^①同时，萨托利建议用决定性属性来界定概念，而这里的问题在于究竟如何界定区分决定性属性和伴随性属性。这种属性的区分又可能会把某种价值倾向或个人偏好卷入其中。

萨托利的这种本质主义立场在之后的一些文献中有更为充分的表述和强调。在其1987年的名著《民主新论》中，萨托利以民主为对象对其本质主义概念观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萨托利强调说，民主是一个客体概念（object concept），是政治系统中的一个具体类别，因此对其的逻辑处理应是二分法的分类处理。^②萨托利反对将民主看成是一个属性概念（property concept），即将民主看成是一个政治客体的属性特征。在属性概念中，逻辑的处理不再是二分的“是与否”，而是连续性的“较大—较小”。^③在1991年的《比较与错误比较》一文中，萨托利用“猫—狗组合”的例子来批评概念的错误组合与使用。萨托利以“美国的联盟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为例来批评这种现象。萨托利指出，在目前的世界中，联盟政府基本存在于议会制政体中（不是美国的总

① 这一特征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有明确的表达。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G. E. M. Anscombe, London: Blackwell, 1968, pp. 10–14.

② 萨托利强调说“我们要确定某个政体是不是民主政体。这也使得由这样的处理而产生的不同是类的不同，而不是程度的不同。”Giovanni Sartori,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87, p. 183; [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③ 萨托利批评道，如果按照属性概念的逻辑，那么“一切现存的政治制度都是民主制度，不管其程度如何小之又小，或者相反，一切现存政体都是非民主政体，不管——比如说——柬埔寨或阿尔巴尼亚与英国相比多么不民主。姑且不论这样的结论多么愚蠢可笑，这种程度至上论或者连续性至上论完全忽略了政治系统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受着结构性机制和原则制约的整体”。Giovanni Sartori,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87, p. 184; [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08页。

统制政体)。在议会制中,政府由议会选出并对议会负责,所以有时会出现非单一政党的政府。因此,在萨托利看来,美国基本上不会存在联盟政府这种情况。而这种误用就是“猫一狗组合”。在该文中,萨托利进一步批评了他所总结为程度主义(degreeism)的观点。^①总之,萨托利反复强调说,那种将种类差异与程度差异相混淆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二、科利尔的实用主义:在两分法和分级法之间

在概念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者是科利尔。科利尔与他的合作者们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来对萨托利的观点作出回应。在1993年的《概念延展新论》一文中,科利尔针对萨托利在《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一文中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批驳。^②科利尔先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萨托利的贡献,然后又指出了萨托利分析框架的不足。科利尔认为,萨托利所依据的是古典分类法,即根据分类层次(taxonomic hierarchy)确定各种概念或范畴(categories)之间的关系。^③古典分类法强调,每个概念或范畴都有明晰的边界,其成员具有相同的属性。然而,20世纪的语言哲学和当代认知科学认为,许多概念并不具备上述属性,因此这

^① Giovanni Sartori “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3, No. 3, 1991, pp. 247–249. [美] 萨托利著、高奇琦译 《比较与错误比较》,载《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第131—132页。

^② 科利尔关于概念的重要论文都是与不同的合作者完成的。在这些论文,科利尔基本上是主要的贡献者,因此笔者在下文表述这些作者时,简化为“科利尔”,而不再表述为“科利尔等”。这一表述调整是为了文章讨论的方便,因为笔者把科利尔看成是概念研究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③ 需要说明的是,科利尔在文章中更多使用范畴一词。科利尔认为,范畴与概念(concepts)的作用相似。科利尔指出,之所以使用“范畴”一词,是因为这一概念更直接地指称出边界的问题,同时这一概念也符合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的用法。莱考夫的研究是科利尔文章的基础。David Collier and James E. Mahon, Jr., “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 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4, 1993, p. 853. 笔者将categories译为“范畴”,以同type(类别)相区分。